

亞洲的決策

[美] 拉 鉄 摩 尔 著
曹 未 风 等 譯

內 部 讀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亞洲的決策

[美] 拉鉄摩爾著

曹未風等譯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1962年·北京

Owen Lattimore

SOLUTION IN AS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45

美国资产阶级反动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1900—)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写成此书。作者从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对当时亚洲局势作了分析和论述,并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横加歪曲诬蔑。他披着和平的外衣,为战后美国在亚洲各地如何进行侵略与进一步实施殖民主义政策多方献策。

本书在解放前有曹未风等译本(中外出版社1946年版)。原书第四章《中国的政党政治和中日战争》及第五章《战争、威信和政治》因故未译,现由我馆编辑部补行译出;作者拉铁摩尔所写的前言以及原书脚注,亦均译齐,以窥全貌。此外,并曾在曹译本的基础之上,据原书作了一些编辑加工。

本书为内部读物,供现代史研究者以及国际关系研究者参考批判之用。

内部读物

亚洲的决策

[美]拉铁摩尔著 曹未风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明庄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 3017·53

1962年3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13千字
印张 4 1/16 印数 1—3,500册
定价(9) 0.60元

前 言

本书脱胎于两篇讲演稿：《日本和亚洲战争的原因》以及《日本和美国的未来》，这两篇讲演稿是 1944 年 3 月在內布拉斯卡州奧馬哈讲的，也就是奧馬哈大学主办的巴克斯特第四届年会紀念演說。本书發揮的其他論点出于 1944 年 4 月魏思理学院宋美齡基金会主办的一次讲演，讲題是《亚洲的自由事业》。这些讲演都发表在探討財政貨幣問題的布萊敦森林會議和探討世界未来組織的頓巴敦橡树园會議以前；两次會議的結論使我对于某些未来的問題采取了积极得多的态度。1944 年夏季和秋季在太平洋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軍事事事件，中国的政局起了急剧的变化，这方面的材料我也酌量采用了。

家父戴維德·拉鉄摩尔和献以本书的我的妻子，讀过原稿并提出修正的意見，我特別要对他們的关切和耐心表示謝意。

欧文·拉鉄摩尔于瑪利兰州腊克斯登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亚洲在战争和政治中的重要性	3
第二章	日本, 不够格的帝国主义典型	18
第三章	中国的革命和民族主义	37
第四章	中国的政党政治和中日战争	56
第五章	战争、威信和政治	72
第六章	吸引的政治	86
第七章	安全的政治性	105
第八章	一个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要点	119

前 言

本书脱胎于两篇讲演稿：《日本和亚洲战争的原因》以及《日本和美国的未来》，这两篇讲演稿是 1944 年 3 月在內布拉斯卡州奧馬哈讲的，也就是奧馬哈大学主办的巴克斯特第四届年会紀念演說。本书發揮的其他論点出于 1944 年 4 月魏思理学院宋美齡基金会主办的一次讲演，讲題是《亚洲的自由事业》。这些讲演都发表在探討財政貨幣問題的布萊敦森林會議和探討世界未来組織的頓巴敦橡树园會議以前；两次會議的結論使我对于某些未来的問題采取了积极得多的态度。1944 年夏季和秋季在太平洋和中国发生了重大軍事事事件，中国的政局起了急剧的变化，这方面的材料我也酌量采用了。

家父戴維德·拉鉄摩尔和献以本书的我的妻子，讀过原稿并提出修正的意見，我特別要对他們的关切和耐心表示謝意。

欧文·拉鉄摩尔于瑪利兰州腊克斯登



第一章 亚洲在战争和政治 中的重要性

在这次战争之中，我們到达了一个把历史分为两个时期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背后一切景象，我們业已经历过来，多少为人所熟知，从而我們常称这次战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分水岭前面的远方景象，在人們感觉之中却还是未知之境，因此对于未来总抱有深刻而且常常是疑虑的关怀。

这次战争之所以构成一个分水岭，是由于亚洲的重要性。几百年来，亚洲这个区域，它的几万万人民的政治历史和经济命运都决定于亚洲以外别的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我們现在却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亚洲所发生的情况，在亚洲所形成的意见，和在亚洲所做的决定，反而大致决定着世界各地事态的演进。

• 我們能否放眼看看分水岭的彼方，观察未来，大体要看我們对亚洲有无充分的知识和对运用自己的知识有无充分信心以为定，犹如测量員运用他的仪器那样。倘若我們觉得亚洲的事情到底和赛马会的事情差不多，那么到了战争结束之时，我們所玩的仍不过是些政治把戏，將我們自己的未来当做一場大賭博来处理，我們的机会就荒廢了。

珍珠港事变前，住在亚洲的美国人都处于一种特权的境地；不是殖民地的特权，就是依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利益。在亚洲的美国商人簡直用不着跑出去兜生意。他們举足重輕，大可坐待生意送上門来。在政治上，呈請的人总是亚洲人；美国人在生活上

除了接受一些呈文，批駁另外一些呈文，再把別的一些轉呈上峰之外，用不着更敏銳的政治觀察。這種生活是不會把職業的外交家的智慧竭力發揮出來的。

即使在日本，外國人也是陶醉在优越感和便利感之中。日本人不肯居于次等地位，卻不會有充分力量公開向這個世界秩序挑戰，乃不得不在長期歲月中秘密經營，準備時機一到就用武力建立他們的“東亞新秩序”。雖然在 1931 年到珍珠港事變這個期間，日本人這種秘密已經逐漸顯露出來，可是他們依然無恙，因為大多數專家們固執着一貫的想法，已經養成一種透過磚牆看東西的怪異伎倆，而不想透過玻璃看東西。^①

美國人不諳習亞洲各種語言，就是美國專家們對亞洲知識淺薄的一個好的例證。反過來說，亞洲人諳習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

① 在 1941 年 10 月 20 日，亦即珍珠港事件一個多月以前，美國駐日大使曾就暴燥的軍國主義者東條將軍接替慢騰騰的帝國主義者近衛公爵出任首相一事發表感想。由於美國報紙和廣播“幾乎普遍地把新政府看作進攻俄國的前奏，或是日本採取某些其他積極行動使日美不免發生衝突的前奏”，我們的駐日大使認為應該“指出或根據事實或根據可靠的臆測的某些因素”，就可“證明那些似乎已為美國公眾所接受的意見……也許並非正確的估價……”

這些因素包括：

一、“我們認為近衛公爵辭職的合理動機是……他相信對美國的談判可以取得更迅速的進展，假如與美國政府打交道的一位首相，他的權力在支持軍部與為軍部所支持兩方面都處於支配地位的話。……”

二、“……東條政府方面願意繼續進行談判的跡象……可以說明，責難東條政府是軍事獨裁，必將推行那種預料要與美國發生武裝衝突的種種政策，是為時過早的。”——約瑟夫·格魯(Joseph C. Grew)：《在日本的十年》(Ten Years in Japan)，第 459—460 頁。

除了指出要花兩個月左右時間來準備並發動對珍珠港這種突襲以外，不必有所評論了。

便有許多利便，這件事就是美國人享受特權地位的好指標。年輕的美國人除了學會一點中國話、日本話、馬來話或洋涇浜英語，囑咐聽差比較方便之外，用不着學習什麼。他們的升遷並不依靠他是否學會一種語言以便充分理解中國、日本、爪哇或印度的商業實際活動內幕。一般都認為，反正當地的“土著”商人會布置好每一件生意，到成熟後讓外國人來交接。那時他自會送到外國人那里去，用英語辦最後的詳細交涉。

在外交場合，用一種亞洲語言談判是罕有的例外。有一些青年外交官、陸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是應該學會一種亞洲語言的；但他們很少在社交中說成習慣。甚至閱讀和摘錄當地報紙大多都假手於“本地”的書記。你要找到一個新聞記者能用一種亞洲語言訪問，或閱讀當地報紙，或當成習慣來在日本、中國或印度內地到處旅行，那真是個例外。大多數教會人士所做的事都是向東方人解釋一些西方的特殊事物。當他們向西方人解釋東方的事物時，他們自然而然只是強調那些需要更多金錢進行教會工作的事情。關於亞洲政治乃至歷史的最有影響的書籍，許多作者並不能閱讀原文資料，而他們卻以權威腔調議論這些人民的事情。

人們常常會聽見一個“專家”發表演說或讀他的文章，將中國描寫成軍閥、鴉片、揩油、小老婆、共產黨的混亂局面，以及胡亂侵犯外國權益的所在。也許一星期後又有篇演說或文章，描寫中國人是怎樣講民主的國民，上面有一幫忠誠而聰睿的政治領袖，他們在其他事情之外，正為美國企業和利潤準備著一個無限制的園地。凡是見聞過這種情形的美國人不妨回味一下：當時他對這些相互矛盾的“專家”們的相對的專門性，覺得有多么可靠的判斷標準呢？

辛亥革命時，大多數美國專家（當然也有歐洲人在內）強烈主

張共和政府絕對不适宜于中國人。中國人只知道皇帝。他們對自治不感興趣。他們所要的，無非是一種家長制的穩定的政府——法律、秩序與合理的捐稅而已。北洋軍閥袁世凱被這般人描寫為正是中國所需要、中國人所能理解的一個有力人物，孫中山則不過是一個和藹可親但不務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不然便是一個輕舉妄動的幻想家。在 1928 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前，國民黨是給形容得象一伙不可管束的人們，被布爾什維主義赤化了，專門掠奪外國商業，自己什麼都創造不出來似的。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而與外商妥協以後，共產黨又被描寫為一群吸血的暴徒，一方面完全受俄國人的煽動，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生活中既無根基又無地位，好象只要將必要的軍火和飛機供給中國政府，它就可在一夜功夫消滅他們似的。這個一夜便可消滅的工作進行了十年，直到 1937 年。同年，日本人經過多年的侵略之後，對中國舉行“最後的”攻擊，於是絕大多數的專家們又一口認定日本人在三個月內便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這只是一個極簡賅的記載，但至少有一點似乎是明白了。美國的“專家意見”是如此之不稱，甚至每每大多數專家意見若屬一致，他們必定是錯誤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都異口同聲強調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放心相信他們嗎？至於日本問題的美國專家的真相，那是更糟了，我們要在下一章中加以考慮。

把我們自己的無知和混淆完全歸罪於專家，當然于事無補。事實是惟有社會公眾責成專家，實事求是，才能造成一種競爭，使好的專家露面，使壞的專家丟臉。各種討論會都喜欢別人把事情告訴他們，很少用他們自己的腦筋提出獨立的主張。但將一個專

家所說所写的編纂一番，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將一張報紙的編輯方針和判斷的經過加以編纂，显示出它对欧洲和亚洲問題注意的比重，它的正确判斷和錯誤判斷的比較，以及它的国内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这也同样是容易做到的事。參議員、众議員和国务院的言行也可以同样方法編纂起来。如果大家已經做到了这些准备工作，专家們不能信口开河，那么我們不久就会有比較好的专家了。

以上这些表示怀疑的和批評性的緒言，不得不說在前面，以求扫清我們認識的障碍。我在本书中并不侈言亚洲内部有什么玄奥神秘之处，非照我的话相信不可。我的一般假定是：凡能懂得任何其他問題的人也都可以懂得亚洲問題。这里所強調的事实是別人不會強調的，但是这些事实都很容易复按。这里有些意見和別人的意見不同，但这些意見的理由是很明白的，而且陈述的方法是訴諸理智，不訴諸信仰。

不幸，我們美国人理解我們所要理解的問題，有若干障碍。一个大障碍是我們的习惯把一切念头都归結在欧洲之上。我們若把政治思想轉移到非洲和亚洲，我們的习惯仍是从欧洲方面想过去。“中立法”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是 1939 年通过的，起草人的脑海中都只有欧洲，以为需要法律約束以免美国卷入其中的只会是欧洲的战争，不会其他。当这种想法盛极一时的时候，恰好又有很多人以为事态的自然发展会变为德国日本分別从两方攻击俄国，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矛盾。換句話說，在亚洲方面的日本总被視為次要的因素；在欧洲方面的德国为主要的因素。1939 年 7 月，欧战爆发前两个月，參議院外交委员会曾劝告国务院廢除日美商約，李普曼把这一件事称为“难以置信的荒唐举动”，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所致。因为这一举动，乃“使日本警惕到我們已成它的死对头”。

而这同一个参議院外交委员会，在同一月內，又做出决定“拒絕解除軍火禁运令，以致英法无法从这里[美国]购买軍火抵抗德国——那个自从 1936 年起就和日本結为同盟的德国！”李普曼的意見是：“这样完全沒有能力指导一国外交的现象，是难以找到比这更好的例証了。”^①

当然，这是事过境迁后才容易看出来的。我們不妨回顾一下，李普曼自己虽然是一个反对德国扩张的人物，却未能理解到要想制止德国，必須也要制止日本。1938 年底，当日本同时占領汉口和广州时，他居然严肃地說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已經取胜了。^②

一个諳知内幕情形的官方机关和美国最老练的国际問題評論家，对于政治形势既有如此重大的誤解，則徒然怨尤以往的过失是于事无补的。这一类的过失往往并不是單純的固执或有意的曲解的結果。无宁可以解釋为构成社会大部分人的特点的許多个人在他們的態度上、想象上和思想习惯上的表現。从 1931 年日本侵犯滿洲起，經過希特勒的登台，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亚，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法西斯之推翻西班牙政府，[慕尼黑协定]之出卖捷

① 《美国外交政策》，第 42 頁。

② “纵然中国人繼續进行一些主动的而更多的是被动的抵抗，日本人已經在战争中取胜了，从今以后，战事恐怕不过是大胜利之后的肃清工作而已。胜利的影响是巨大的。曾經对前进中的日本帝国进行艰苦抵抗的中国，将变为日本帝国的臣属。一度是最大的負債，已因这次征服而变为无限价值的财产。

“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住居着的东亚，日本人是至高无上的。俄国人孤立无援，法国人目瞪口呆，英国人的地位陷于支离破碎，而美国人則已撤退（虽然我們还糾纏在菲律宾）。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的战略基础，看来已經穩固地树立起来了。”——华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紐約先驅論壇報》1938 年 10 月 27 日。

克，欧战之爆发，以迄于 1941 年的珍珠港事变——在这整整十年之間，美国人优柔寡断，一錯再錯。每逢一次危机，我們都游移在錯誤的方向，从来没有走到正确的方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思想中支配着其他一切的事实是，美国参加了并且决定了一个欧洲的战争。并且当我们和国际联盟背道而驰而与哈丁总统“重返承平之世”时，我們（指一般民众而不是指少数糊涂的政客）都觉得美国正及时地逃出了欧洲以及欧洲的纷扰局面。

所有旧日的假定和思想习惯都随着这个战争的结果而愈益燃熾起来。欧洲越发变成了涉及孤立主义与自給自足思想和討論的焦点，至于世界其他各地的事情尽可不接触，不卷入。人們以为，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照欧洲的办法行得通，則在世界各地都能行得通。如果照欧洲的办法行不通，則用什么办法也行不通。

我們在談判和推行政策之中，正如在辯論和思想中一样，都是以欧洲做中心的。在凡尔赛會議中，本可对付日本一下，以免集中于欧洲問題，然而不此之图，反把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怨言加以抹杀，听任中国退出會議。

美国人現在回顾一件事情是很有益处的，就是：整个說来，日本的蹶起是受到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輿論的垂青的。美国的国策一向是受了一种考虑的影响，即中国的殖民地瓜分危險还没有过去。美国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有自由竞争，而不是把中国領土分割成若干独享的殖民地。1899 年的門戶开放主义就是为贯彻美国政策而制訂的。

这是一种“分我一杯羹”的主义，虽然它連提都没有提到机会的均等。美国不願将中国弄得四分五裂，深怕那些在中国业已获

有殖民地所有权的国家会銷售它們自己的貨物，投入它們自己的資本，而損及美国的企业。美国那时虽然已有实力参加差不多任何經濟角逐，可是还未确定何种活动对它最重要。因此，它希望别的任何国家都不要获得那些在将来会妨碍美国利益之加入与发展的权益。不过，那时某些“势力范围”已由欧洲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来，却是不得不承认的。美国的举措旨在避免势力范围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业已划定了的，并无取消的企图。

門戶开放是美国多年来在中国推行政策的一貫发展，并不是另辟蹊径。过去美国从不要求在条約口岸取得租界，正如它在1899年不要中国被瓜分一样。“租界”就是中国政府在条約口岸交让給外国政府的一块地方。在租界里，外国国旗飄揚，外国政府有其自己的警察和法庭。此外还有一两个“租界”，并不是交让給某一外国政府，而是国际性质的，美国公民居住在这些租界和公共租界里，和其他外国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受美国法律的保障在內。美国认为对中国的这种侵占不应该再加以扩张；但我们却又认为无论再对中国有什么进一步的侵占时，美国人均有利益均沾之权。一直到珍珠港事变为止，我們都在这帝国主义时期的机构之中自由运用。前美国駐日大使格魯的所有照会和日記都显著地証明了我們官方兴趣所在，无非是不管日本迫令中国签订什么协定，皆不得削減美国現存的特权或排除美国于未来的机会之外。

还有，我們总要記住，門戶开放是一种英美共同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一种颇为普遍的傾向，以为英国是海約翰(John Hay)所“制止”的国家之一。其实海約翰的照会是后来出任美国駐中国公使的柔克义(W. W. Rookhill)所促成的。柔克义是海約

翰的朋友，和英国当局过从甚密。門戶开放宣言中很多措辞都出自英国人賀璧理(Hippisley)的手笔，他曾在控制中国政府主要稅源、中国海关的国际的(但以英国为主)官場任职。解釋是英国在中国据有最强有力的地位。他們宁願中国在一种国际特权制度之下受着剝削，运用各种花样，例如条約口岸，治外法权，海关控制权，炮舰航泊在中国領海和在长江上下游行駛权等。如果大家都公开角逐于吞并在中国的殖民地，則英国定会獲得最大的一份。因此之故，英国一鼓励美国推行門戶开放政策，并在幕后全力支持它，大势便决定了。

誰知道在英美这种“分我一杯羹”的主义底下，却暗中留下一个大漏洞，使我們反对日本侵占中国的立場根本为之削弱。在我們所有向日本提出的抗議中，英美从未駁斥过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的权利。我們只抗議日本所获得的种种特权，不应把我們排除在外。

在1904—1905年，当日俄战争之时，門戶开放主义只有短短的几年历史，还未到达充分的权威和稳定的程度，难免有随时被推翻的危險。除了俄国，所有列强都离中国相当远，只有海路可通。在他們爭相剝削中国的竞赛中，相互同意一些“賭規”是比較容易的。唯有俄国与中国陆路相接，所以始終潜存着一个危險，即俄国会以陆军造成一种欧美海軍无法对付的形势，而推翻賭規。

在这种形势之下有一种感觉，就是日本或可发展成为一只对付俄国的好的看家狗。一个好的看家狗当然有权在南滿(俄国的大門口)盘踞一个好狗窩，尽管南滿是中国的領土。美国輿情是拥护这种国策的，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一个有用而决无危險的国家，因为沙皇从不为美国所欢迎，而沙皇流放政治犯到西伯利亚的作

風斷非美國人所贊許。因此，西奧多·羅斯福很容易出馬擔當日俄談判的斡旋人物，而軍事勝負雖未完全定局，朴資茅斯條約竟使日本比它理應得到的還更有利的條件。

美國情願給予日本特殊方便，這種意念到 1917 年藍辛——石井換文時登峰造極。藍辛的照會中有一段說：“美國和日本政府承認：國與國間如有領土接壤便發生特殊的關係，職是之故，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權益，尤以和它的屬地連接的地方為然。”不錯，在 1923 年，“由於在華盛頓會議所達成的諒解”，上述藍辛——石井的協議已被廢止，“不再有任何效力”^①，不過從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到 1941 年的珍珠港事件期間，許多以與日本通商為有利可圖的美国人，依然替日本強辯，說日本由於和中國領土相接之故實應享有特殊權益。

華盛頓會議有四個主要的結果，需要加以簡要的詮釋：

一、英國廢除英日同盟。這事表示，歐洲問題假定已告解決，此後實力應由歐美方面向亞洲發揮，而不應從亞洲內部過於強大的基地發揮出來。這事解除了美國一種深刻的不安，就是擁有亞洲灘頭陣地的日本，和除開這個同盟之外在政策上很久以來就與美國比較接近的英國，兩者之間的同盟所引起的不安。

二、日本退出山東。這事重行肯定了一種設想，即以為日本正當的作用（除在滿洲外），只能在英美所主導的一連串條約、特權、統治、保障的體制中占一個小伙伴地位，而這一套體制，有一部分是把中國恭維起來的，有一部分是把中國箝制下去的。日本不應該建立短距離的管制，而干涉英美長距離的管制。

^① 原文參閱斯太格 (G. Nye Steiger): 《遠東史》(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1936 年波士頓出版, 第 765—766 頁, 第 802 頁注 1。